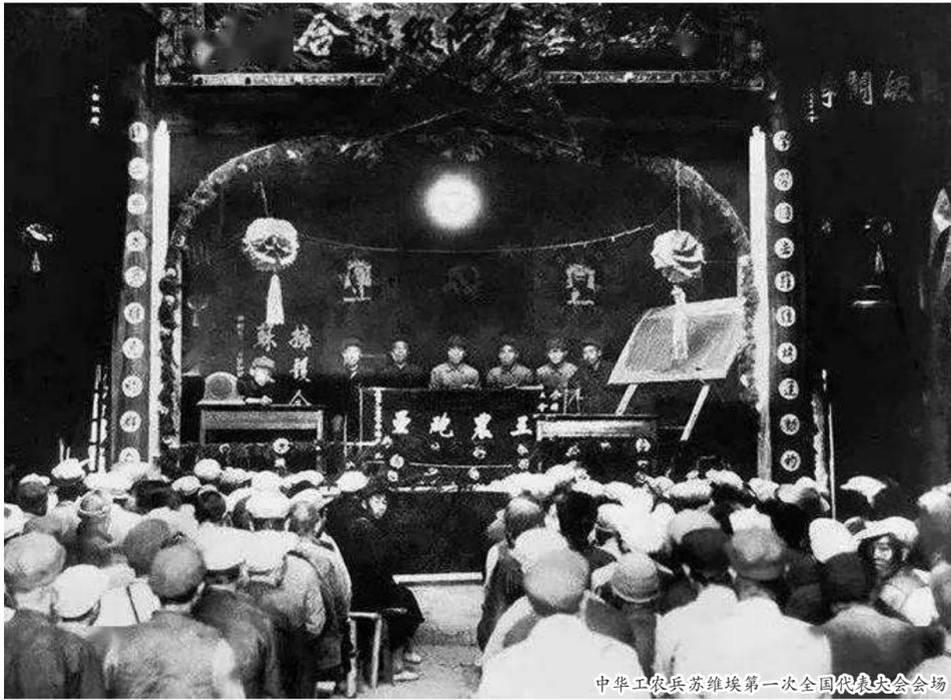


筹备召开“一苏大”的波折

周铁钧



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

1930年,中国工农红军经过浴血鏖战,赢得第一次反“围剿”的胜利。此后,随着革命根据地和人民武装力量的不断发展、壮大,各地红色政权纷纷建立,中央苏区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。

2月3日,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讨论筹备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(简称“苏域会”)等问题。在中央局书记周恩来的提议下,成立了由中共中央、总工会、军委、农委、共青团及革命团体组成的“苏域会”筹委会,为召开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(简称“一苏大”),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展开准备工作。7日,“苏域会”筹委会决定:1930年5月20日在上海秘密召开“苏域会”,要求各苏区选出2至5名代表,红军每个军选派1名代表,游击区、革命团体、工农群众代表由各地酌选,做好出席会议的充分准备。

“苏域会”在上海秘密召开

1930年5月,“苏域会”召开在即,保护代表和会议安全就成了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(简称“特科”)最为重要的任务。时任“特科”情报科长的陈康认为,众多与会代表长时间聚集,极易引起敌特的注意,因此必须建立一个经营性场所作为掩护。几经研究,“特科”决定建一所医院,让会议代表、保卫人员、工作人员全部化装成医生、护士、患者,进进出出就不会引人怀疑了。

在征得中共中央同意后,“医院”筹建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。此时,陈康收到一个情报:敌特机关已探得“中共将在上海召开秘密会议”的消息,虽然尚不知会期、会址、人员等细节,但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已悬赏50万大洋收买线索,并派出密探、特务到处搜查。情况紧急,“特科”立即向上级请示,是否推迟会期?而此时,中共中央已将召开“苏域会”的决定向共产国际正式报告,并得到批准,各地代表已经出发赶往上海。中共中央指示:会议如期举行,但要动用一切手段、条件做好保密、保卫和防范工作,确保万无一失。

5月中旬,上海派克路、白克路交汇处的卡尔登影戏院附近,一所四层楼高的私立医院开业,它的出现悄无声息,周边的酒吧、舞场、咖啡厅、麻将馆却每天灯红酒绿、通宵达旦。实际上,这所私立医院就是“特科”为“苏域会”准备的会址。敌人绝难想到,共产党居然在繁华的闹市召开秘密会议。

为确保会议万无一失,“特科”在医院内外布置了三道防线,一是医生、护士、职员、杂工全是“特科”队员,负责保卫工作,住院“患者”和“陪护亲属”则全是会议代表(如真有患者上门,“医生”会讲出各种理由,把他们

转介到附近的其他医院就诊);二是一楼的后窗全部打开,跳出去就可进入另一幢楼房,既可临时避险、又可迅速撤离;三是在医院周围和附近街道上部署了60多名“特科”同志日夜警戒,一有情况立即报警。

1930年5月20日上午9时许,“苏域会”在“医院”四楼召开,参加的代表共50人,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也出席了会议。此时,国民党特务机关已经得知了中共的开会地点大约在派克路、白克路一带的情报,便对这一区域展开大搜查。这时,警备司令部密探宋再生提议:要“有门必入、有人必问”,宁愿错抓也绝不疏漏。此提议马上得到熊式辉的赞赏,随即命宋再生带队搜查。

实际上,宋再生是打入敌人内部的“特科”人员。为了给会议争取时间,他带着特务大张旗鼓地“细致搜查”,以至于敌人的一举一动都暴露无遗。与此同时,“特科”同志还特意安排一些进步工人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。每次遇到上述情况,宋再生就命令特务停止搜查,前往出事地点“平息事端”。5月23日午后,特务们终于搜到“医院”,此时“苏域会”已结束,人尽散去,看不出一点曾开过会的痕迹。

“一苏大”会期曾数次变更

1930年9月12日,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(以下简称:中准会)在上海召开全体会议。当时,由于白色恐怖,全国多个中共省委机关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,许多地方的党组织需要恢复或重建。为此,“中准会”决定将原计划1930年1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“一苏大”推迟到同年12月11日在江西苏区召开,“中准会”也同时转移到苏区继续开展筹备工作。

1930年10月,蒋介石调集重兵向湘、鄂、赣苏区发动大规模进攻,迫于严峻形势,“中准会”10月18日在上海召集12个革命团体代表开会,决定将“一苏大”会期改为1931年2月7日。

1931年1月,项英受中共中央委派到江西组建苏区中央局,向毛泽东、朱德等红军领导人传达了“中准会”在江西苏区召开“一苏大”的决定。但此时,“中准会”秘书长林育南携带大量会议文件从上海秘密赶往江西,不料他途中遇险,被迫返沪不久即被捕,壮烈牺牲,“一苏大”也因此再次延期。

同年5月,中央红军取得第二次反“围剿”的胜利,苏区中央局发布《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言》,决定于1931年8月1日召开“一苏大”。同年7月,蒋介石发动了第三次“围剿”,中共中央再次决定将“一苏大”会期改为11月7日。

1931年初秋,毛泽东、朱德等红军领导人来到瑞金县,听取了县委书记邓小平的情况汇报并实地考察,认为瑞金地处红色根据地中心区域,周边有武夷山、紫华山环抱,地势险要,易守难攻,人民对敌斗争经验丰富,群众基础扎实。经商议决定,将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部设在此地,并向中共中央建议:召开“一苏大”,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地址也选在瑞金。

“一苏大”在瑞金胜利召开

1931年11月7日早晨,初冬的瑞金笼罩在阵阵寒意中,来自各地苏区和红军、全总以及革命团体的610名代表齐聚“一苏大”会场——叶坪村

谢家祠堂。

谢家祠堂是一座古老的木结构建筑,陈年的屋宇虽已满目沧桑,却被布置得时代气息浓郁: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方,左右高悬的两个巨大绣球球映着一盏特号汽灯,将屋子照得“如浴灿烂”。正中墙壁高挂红旗,两侧分别是马克思、列宁画像,会议桌前红色横幅书有“工农炮垒”。主席台前捆扎出宽大的彩门,门楣横写“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”,左右有对联“建立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工作”“学习过去苏维埃运动的经验”,会场屋顶、墙壁贴挂着“拥护全苏大会”“工农当家作主”等标语和三角彩旗。

上午8时许,“一苏大”隆重召开,项英代表大会主席团致开幕词,毛泽东代表苏区中央局作《政治问题报告》。随后,全体代表来到村东的草坪,观摩了盛大的阅兵仪式,中共中央向红军10个军团授予锦旗,为彭德怀、方志敏、王稼祥等8位红军将领颁发勋章。

随后的会期里,代表们相继讨论、审定、表决通过了宪法大纲、土地法、劳动法、《婚姻条例》、《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》等法律法规议案,同时选举产生了由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朱德等63人组成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,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成立。

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,毛泽东全票当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,他在讲话中说:“我们过去握锄头把子,扛枪杆子,今天又要握起印把子。过去我们只会种田、会做工,后来学会了打仗,现在还要学会治理国家。”当日,他挥笔题词:“苏维埃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机关,是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。”

(作者单位:辽宁省锦州市作家协会)



1947年下半年,随着人民解放军在全国主要战场对敌作战不断取得胜利,国民党军兵力受损严重,被迫由进攻转入防御。在广东,国民党当局为继续实现其“安定华南,支持华北、华中,确保华南最后堡垒”的企图,制定了对中共领导下的广东各人民武装实施“分区扫荡,重点进攻”的“清剿”计划,向各游击区发动猖狂的进攻。

为加强对各边区武装斗争的统一领导,打破敌人的“清剿”,并为日后建立战略游击根据地做准备,中共香港分局决定在华南各边区区域成立各边区党委。1948年春,香港分局决定成立包括广东南路、中区及桂东南、桂中南在内的中共粤桂边区委员会(简称“粤桂边区党委”),粤中地区各县也划入粤桂边区范围。鉴于粤中地域较广,香港分局又决定在粤桂边区党委属下设立一个分委机构,定名为粤桂边区党委广南分委(简称“广南分委”),专责领导粤中地区的党组织和武装斗争。

1948年6月,中共广南分委、广南军分委正式成立,从此粤中区的党组织和人民武装实现了统一领导,大大加快了武装斗争发展的步伐,保证了反“清剿”斗争的顺利进行。

国民党广东当局对粤中第一期军事“清剿”失败后,又于1948年7月实施“肃清平原,围困山地”的第二期“清剿”计划。经过第一期反“清剿”斗争的锻炼,粤中各人民武装的战斗力已大为增强,因此敌人第

二期“清剿”一开始便连续遭到沉重打击。

9月29日,国民党军一个加强连由新兴开往高明实施“清剿”,于29日傍晚进驻布辰村。

新(兴)高(明)鹤(山)游击总队接到情报,立即向广南军分委领导进行了汇报。军分委决定集中新鹤鹤总队的广东连、湖南连,广阳支队的钢铁连,广南军分委直属的山东连、警卫排三支队共300余人的优势兵力,在布辰岭打一场伏击战,力求全歼敌人。

布辰岭位于新兴与高明两县边界,其东侧的塘面村,坐落于长约1公里、宽约半公里的谷地,谷地中间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小路通向合水,南北两面均为山岭,地形十分有利于隐蔽。9月30日拂晓前,参战各部队进入塘面村伏击阵地。

30日上午8时许,敌人翻越布辰岭进入塘面村谷地。9时15分全部进入伏击圈,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,战士们立刻居高临下向敌人猛烈射击。敌人遭到突然袭击,顿时死伤惨重,残部妄图从原路逃回,却发现原路已经被游击队的火力封锁,只得趴在稻田里应战。不久,游击队从四面发起冲锋,残敌纷纷放下武器,举手投降。11时5分,战斗胜利结束。此战,粤中人民武装全歼敌人一个加强连并缴获所有武器装备,取得了开展反“清剿”斗争以来最重大的胜利,得到中共香港分局的通电嘉奖,称此战为“模范战例”。



胡春霖早年加入同盟会,追随孙中山、黄兴从事推翻帝制、建立共和的革命活动。民国成立后,胡春霖先后任教于安徽农业学校、中国大学、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、北京民国大学,为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作出了贡献。1926年春,胡春霖受国民政府之邀南下广州,先后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、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事等职。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,胡春霖被委任为安徽省建设厅长,并参加筹办安徽大学活动,后因力主抗日,受到蒋介石排挤,又因探视被蒋介石软禁的李济深而受牵连,只得辗转各地,从事教学、研究工作。

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,胡春霖公开提出“全国团结、抗日救国”的观点,并积极参与了李济深、朱蕴山等组织的抗日活动。

1941年3月,胡春霖病逝于重庆。胡春霖逝世后,为缅怀其功绩与风范,其生前好友李济深、张难先、冯玉祥、于右任、张治中、朱蕴山等人,共同发起创办春霖中学的活动,以资纪念。

1944年3月,冯玉祥、于右任、张治中等在重庆报刊上公开发表启事,宣布举办为春霖中学筹募基金的活动。该启事一经公布,便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,纷纷捐款捐物。

(作者单位:辽宁省锦州市作家协会)

胡春霖与春霖中学

张卫强

不久,又成立了春霖中学董事会,决定由李济深担任校董会董事长。经董事会议决定,董事胡春霖(胡春霖长子)、校长胡士善(胡春霖长女)具体负责筹建事宜。经多方努力,校址定在四川省铜梁县安居镇谦溪祠。经当地热心教育界人士的大力赞助,春霖中学于1944年暑期按时招生,开学上课,并按照职业教育设置学科。该校开学后,李济深亲临指导,赞扬学校“工业救国,前途光明”,鼓励学校要“继承春霖遗志,为国家培养人才”。

1945年抗战胜利后,经春霖中学董事会议决,派董事副校长胡光亚先行到安徽芜湖选定校址,由总务主任胡绍瑜主持修建校舍,筹备招生、开学事宜。经多方努力,春霖中学于1946年9月从四川铜梁县迁往安徽芜湖大砻坊新校址。芜湖大砻坊当时有益新面粉公司等一批工业企业,又邻近商家云集的十里长街。学校从“为芜湖培养工商业人才”这一实际出发设置学科,以推动芜湖现代工商业的发展。

解放战争期间,春霖保护了大批进步学生。芜湖解放前夕,该校进步师生积极参与了迎接解放的工作,曾粉碎了国民党军逃走前“欲炸毁存放于学校内大批军火的企图”,并将这批军火安全移交进进驻芜湖的解放军部队。



“帅”的本意为军队的统帅,至少从宋代开始,地方军事长官即开始被简称为“帅”,此后历代相沿,到清代更为普遍。由于总督和巡抚拥有军事上的统驭权,故其部下和同僚皆以某“帅”尊称之,习惯的叫法是在“帅”字前冠以姓氏和本人字号中的一个字,如浙江巡抚左宗棠被称为左季帅(左宗棠字季高)。至于“大帅”之称,在初期只是对钦命统帅大军出征的大将军或经略的尊称,如乾隆年间的大将军福康安曾数度领兵出征,被称为“福大帅”。但到清代后期,此称已滥,钦差大臣或威望较高、资较深者,中央官员中尚书、侍郎带兵出征者,多有被称为“大帅”者。到光绪年间以后,各省督、抚、提督几乎无不以被称为“大帅”为荣。其中老年资深者,便被称为“老帅”。

辛亥革命期间,独立各省一般都模仿首先起义成立军政府的湖北,设置都督统率本省军队并兼管民政,其职权相当于清代的巡抚,所以都督都被尊称为“帅”。如黎元洪曾言,他于1913年12月辞去湖北都督,进京专任副总统,是“欲求国家统一,不得不解解兵柄,为群帅倡”。这里的“群帅”即指各省都督。

北洋时期的“帅”字称呼

黄宗慈

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窃取政权后,其主要骨干占据了从中央到大部分省份的要职。这些人在清代已是高级官吏,所以清代的一些官场所呼有相当一部分保留了下来,“帅”的称呼就是其中的一种。1914年6月,袁世凯宣布裁撤各省都督,在北京设置将军府,另遣将军掌管各省军政。1916年7月,大总统黎元洪下令把将军改称“督军”。1922年6月,各省军阀纷纷宣布“废督裁兵”,将督军改称“督理”或“督办”。1924年段祺瑞临时执政政府下令各省军政长官一律称“督办某省军务善后事宜”,仍简称“督办”。名称虽不断翻新,权力却未受到丝毫削弱,“帅”的称呼也一直沿用。

北洋政府时期,省级以上的地方军事长官主要是巡阅使。1920年,全国有长江、直鲁豫、东三省、苏皖赣和两湖等巡阅使。按惯例,巡阅使即可称为“大帅”(或“巡帅”)。据记载,北洋军阀中称“大帅”的有三个人,即长江巡阅使张勋、直鲁豫巡阅使曹錕和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。吴佩孚出任两湖巡阅使称“大帅”后,曹錕就改称“老帅”,以示比“大帅”更高一等。

红二、红六军团巧渡鸭池河

贾晓明

(定)、毕(节)地区建立根据地。红二、红六军团领导认为中央军委指示完全符合实际,决定向黔(西)、大(定)、毕(节)进军。对此,国民党政府惊慌失措,将贵阳、黔西等地的部队全部集结于乌江、遵义一带,企图配合从湖南尾追红军而来的敌人前后夹击,将红二、红六军团全部歼灭于乌江两岸。

红二、红六军团总指挥部判明情况后,立即命令先头部队——红二军团四师北渡一个团,虚晃一枪,在敌人庆幸红军中计的时候,红军主力突然挥戈南下,前锋进攻贵阳。国民党军害怕贵阳有失,急调正在追剿红军的两个师回贵阳加强防守,又调集3个师由遵义出发,南渡乌江,企图与驻贵阳的军队夹击红军。红二、红六军团主力见敌人被调动,突然来了个大转弯,从北面绕过贵阳,向西北急进,沿途击溃敌人的保安团,袭占修文县城,造成经息烽北渡乌江的态势。国民党军害怕红二、红六军团渡江夺取遵义,慌忙在乌江北岸加紧布防,并命令两个师向遵义集中。红二、红六军团见敌人中计,于是再次改

变方向,星夜向西秘密急进,直趋乌江上游鸭池河,决定在这里抢占渡口渡江,一举摆脱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。

鸭池河两岸山高崖绝,陡峭的山崖高达数十丈,水流湍急,鸭池河渡口位于清镇与黔西交界处,是贵阳通往黔西北的交通要道,当时的交通往来全靠木船摆渡。西岸是黔西县的烂泥沟,是川盐集散地,驻有敌人1个营300多人,驻扎在大关、小关上,只有约20人驻守在鸭池河渡口北岸,控制住了摆渡船只。

2月1日下午,红二军团抽调120多名经验丰富的侦察员组成精干的便衣侦察队,从清镇卫城出发,向鸭池河渡口前进。当日深夜,红军侦察队到达新店镇茶店村,夜袭当地保警队驻地神庙,俘获敌人80余人,并从俘虏口中得知敌人在鸭池河渡口的兵力部署。

侦察队随即兵分两路:一路由清毕公路直下鸭池河,争抢时间控制南岸渡口;另一路从晚上渡口秘密过河,迂回到北岸守敌的侧后,夹击敌人。与此同时,担任前卫的红二军团六师也紧跟侦察队之后来



1935年9月,国民党军调集130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苏区发动新的“围剿”。根据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委会决定,红六军团第18师留在苏区坚持斗争(后于黔东江口地区与主力会合),红二、红六军团主力于11月19日由桑植地区出发,实行战略转移。

红二、红六军团先突破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,经湘南进入贵州省,于1936年1月到达石阡地区。19日,红二、红六军团指挥部在石阡县城的天主教堂召开会议,分析敌我态势以及地形条件,决定放弃在石阡、黄平一带建立根据地的原定方针,做出在黔(西)、大(定)、毕(节)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部署。

1月20日,红二、红六军团从石阡出发,突破敌人封锁线后继续向西转移,途中接到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,应以进攻贵阳的姿势,速转黔(西)、大